

周玉明 著



最耐读的是人

——周玉明名家采访随笔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最耐读的是人

——周玉明名家采访随笔

周玉明 著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顾 潜

责任校对 马金宝

最耐读的是人

——周玉明名家采访随笔

周玉明 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6

字 数 333 000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7-309-01764-1/I·131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都市的良知

(序言一)

余秋雨

—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确确实实发生在1993年的上海——一位中年钢琴教师因患重病而生命垂危,他的学生、两位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为他举办了一场演奏会。这场严肃而悲怆的演奏会竟然爆满,有许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这个聚会。听完演奏,上百名孩子出人意料地爬上台去用小手奉上自己的捐款。钢琴教师在病床上听完演奏会的实况转播后几小时就与世长辞。追悼会上,无数与这位教师素不相识的市民捧来了数不清的鲜花,据说那天殡仪馆一带的所有花店都被席卷一空。钢琴教师生前住在一幢公寓的五楼,他死后,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鲜花花篮,从公寓底层大门排起,一层层排上去,一直排到钢琴教师故居的门口。

这位钢琴教师的名字现在在上海已被大家熟知,他叫范大雷,国际著名的钢琴家孔祥东、周挺便是他的学生。为什么范大雷之死会使整座城市哆嗦了一下呢?为什么熙熙攘攘的人群都突然为之而停止,踮起了脚尖?只有一种解释,在不经意之间,这里出现了一种精神仪式,吸引着一切有某种精神需要的人都虔诚地参与其中。这种精神需要,就是人们对自己心底埋藏的珍贵部位的自我确认。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奉献,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教师,

什么是学生,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被大家遗忘了的问题,都会在这种参与中浮现在眼前。人们围绕着范大雷所做的一切,强化了自己心底的善,也加重了一座城市的分量。

那么,这个精神仪式究竟是谁张罗起来的呢?范大雷本不是知名人物,他在卧病后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成名的学生来守护病危的老师也不是什么新闻,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刻企图扬名的欲求。是谁在平常中发现了不平常,在悲剧中发现了崇高,在复杂的都市风景中找到了足以燃烧千万人心灵的火神呢?是新闻界。

那场动人的演奏会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追悼会的消息,是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不顾级别规范及时传播出来的;追悼会后很快就直播的、催人泪下的专题节目,则是东方电视台制作的;其他各报各台,也都有积极的作为。这无疑需要一大批记者和编辑同时发现这件事的精神价值而立即作出决断。这种情景果然出现了,没有上级指令,没有家属求情,更没有实利诱惑,竟然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么多新闻媒介全都动员了起来。说实话,今天上海文化心态的许多方面我不敢恭维,但遇到这样的事情,却又常常使我抬起头来重新打量。

在这样的事情中,很多上海人都能猜得到,有一位女记者一定会穿梭其间。果然没有猜错,是她,周玉明。那几天,文化界的朋友打电话来总会问一句:“周玉明写范大雷的文章看了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周玉明使社会各界认识范大雷的。早在1991年年底,周玉明开始对这位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的钢琴教师进行采访,理由只有一条:他的好几位学生在国际比赛中一再得奖。周玉明似乎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躲在国家荣誉背后的“隐身人”,而当她发现这位“隐身人”正默默无闻地陷于辛劳、疾病和住房困难之中,就以一种职业本能站出来大声疾呼了。1992年5月22日,《文汇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周玉明写的长篇通讯

《托起颗颗耀眼的乐坛新星——记培养出孔祥东、周挺的上音附中教师范大雷》。这是后来发生的整个社会性精神仪式的前奏。当这位正值盛年的音乐教育家快速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周玉明急切地往来于医院、新闻单位、募捐演奏会和追悼会之间；在范大雷去世一星期后，她便写出了那篇催人泪下的《红烛泪干》在《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再过一天《文汇报》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她写给九泉之下的范大雷教授的长信——《无言的辉煌》；现在，她又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从范大雷父亲范继森到范大雷这两代音乐教育家的纪实文学《泪洒天堂路》……

不言而喻，周玉明这种彻底的投入和自始至终的负责，是极其真诚而毫无私利可言的。她一定把这样的事情看成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精神责任。她一定把这样的遭遇看成是修炼自身生命价值的难得机会。临终的范大雷要从这座城市得到什么？这座城市要从临终的范大雷那里得到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她更有把握回答的是后者。因此，她的全部努力的成果，能给予范大雷的甚少，而能给予这座城市的则甚多。整座城市都被她的真诚所感染，她以一个精神仪式执掌者的身份成了这座城市的良心。一个记者，一生能做成这样一二件大事也就很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和自己居住的城市。

二

然而周玉明远不止做了这件事。

前不久看到宗福先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十几年前的一件旧事。那时他还是一名普通工人，社会知名度等于零，写了一部话剧《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演出，周玉明偶然地发现了，在《文汇报》发表了大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予以介绍。于是这部戏立即红遍全国，几乎也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释放郁愤的一个精神仪式。宗福先成名了，而且以后又以人品和文品越来越被

上海文化界所熟知，但周玉明与他的往来却不再密切，她急忙地躲开光圈，潜入人海，去寻找另一些需要帮助和呼吁的人物了。

当成方圆还是一个二胡演奏员第一次客串演唱时，周玉明立即发现了她的潜质，当晚便发出报道并把她的照片与一些知名歌唱家并列在一起。成方圆受到了至关重要的鼓舞，而周玉明却受到了嘲讽，有人说她“把一个拉二胡的一夜之间捧成了歌唱家”。周玉明等待时间和事实说话，而时间和事实果然说了话。

使不成名的艺术家为社会知晓，并不是周玉明唯一的职责。她知道，成了名而不被社会所理解，可能是中国艺术家们更大的苦恼。于是，周玉明花费更大的精力向社会叙说着一位位艺术家，特别是一位位最不容易被社会理解的女艺术家的内心和经历。得了国际大奖，她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身患重病，为什么还是弦歌不绝？功成名就，为什么爱得这般苦涩？人到中年，为什么还要飘洋过海？……人人都在享受着她们的艺术，为什么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灵魂？不了解她们的灵魂，能欣赏好她们的艺术吗？周玉明狠下心来做一件事：尽量不要让剧场中的明星成为灵魂上的孤独者。即使读者一时还无法与艺术家沟通，那么作为采访者，至少可以献上自己的一份理解和友情。她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著名评弹艺术家徐丽仙最后竟然一把把她抱住，呜咽着说：“小周，你懂得我。世界上有多少假的东西，只有艺术和你才是真的！”我想，一切迷醉丽调评弹的无数观众看到这一情景都会由衷地感谢周玉明的。周玉明几乎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给这位孤寂地演唱了一辈子的艺术家以温馨的反馈，在长期卧病的徐丽仙眼中，周玉明相当于半个世界。

即便是最著名的艺术家也会遭到不公平的责难，周玉明对此也不袖手旁观。记得去年春天，大音乐家朱践耳先生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诉述他遭受某种左派理论的公开非难而无法辩驳的恼人景况。我正想仔细研究一下材料为朱先生说几句公道话，没想到周玉

明已经写出了长长一篇《朱践耳的命运交响曲》发表在《文学报》上。读了这篇长文,觉得那么转弯抹角的非难也就没有必要去理会了。

总之,周玉明千方百计地想 let 社会理解艺术家。本来,一些人不被社会理解并不是一件大事,犯不着记者为此而繁忙,但艺术家是社会的精 神塑像、人格造型,或者说,是社会上人与人互相理解的中枢。素不相识的各色人等,就是通过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共同理解来进行沟通的。当艺术家无法被社会理解时,这种沟通也就会中断,由此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艺术家本身。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不理解贝多芬,是贝多芬的损失大还是社会的损失大?因此,乍一看周玉明是在维护着一个个艺术家,实际上她是在维护着整个社会,她不允许她所立足的社会对艺术家抱一种陌生和抵触的态度,她不忍心看到她身边的城市因缺少与广大民众生息与共的艺术家而失去魅力和风采。

周玉明的这一使命,在我们社会里常常显得特别沉重,因为我们周围不少人还不习惯用平等的态度来看待知名的艺术家,往往在过度的仰望和羡慕中夹杂着某种疑惑和觊觎,这就给一些嫉妒的流言提供了传播的温床。因此,越是杰出的艺术家一生遇到的麻烦事常常也就越多,就像雨果所说的,越光亮的正面必然带来越黑暗的阴影,而我们的艺术家又未必能凭个人的力量从阴影中走出。由于艺术家的知名度往往与流言的传播成正比,这种阴影不仅会快速扩大,而且也会构成一种邪恶的仪式,就像徐晓钟先生在《桑树坪纪事》中排演的那场“围猎”。回想一下,我们民族,乃至我们文化界历来遭受的灾难,不正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口耳相传中成倍递增的么?

处于困境中的艺术家往往并不企求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解围,他们所要求的大多只是希望揭示事实真相。但难也就难在这一点,以致阮玲玉、老舍他们不得不用生命的代价来提醒人们自己究

究竟是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记者（哪怕是一个）敢于冲破偏见的围墙直逼原始真实的勇气就弥足珍贵。记者——这实在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高贵的职业之一，他们可以不参加争辩，不发表评论，而只用事实说话，他们的全部道义感都隐含在对事实真相的充分挖掘中，他们应该是不可辩驳的，他们的生命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严谨。现代社会纷纭复杂，一切事物的真相都不易一眼看清，人们在不明真相前就投注评论的情感，哪怕是最真诚的，也往往会把事情彻底颠倒，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因此，真实是现代社会的基点。既然记者被赋予把握真实的责任和能力，那么，只有他们才能有效地消解那些以不真实的流言为触发点，以惩善扬恶、走火入魔为归结的一个个起哄仪式，代之以范大雷逝世前后我们看到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仪式。

周玉明多次说过：“作为记者，我必须尽一切可能到达现场，亲眼看到事实真相，亲手接触实物证据。没有第一手的真实素材，我什么也说不出。”这几句话所说的是记者起码的职业素质，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缺少实证意识、特别喜欢随声附和而且往往附和得慷慨激昂的国度里，却具有一种全民性的启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玉明其实没做其他什么事，只是让社会认识了一大批艺术家的本来面目。因此她的贡献与其说是道义上的还不如说是历史上的。十分了解周玉明的哲学家赵鑫珊先生说，将来若有人写一部当代中国艺术史，周玉明也许不是一个完全不屑一提的名字。赵鑫珊并不是说周玉明本人要在艺术史上占据什么篇幅，而是指她使历史变得更真实。

我想，当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个善良的艺术家和文化名人的真实生命，都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贴近、去温暖的。他们发现范大雷时已经晚了，即便洒下那么多眼泪和花瓣也没有能够抓住他。人们抬起双眼茫然四顾：这座城市，还有哪些没有朽逝的高贵的生命需要卫护？有没有可能，不要让如此感人的精神仪式只是发生在

追悼会前后？人们饥渴地搜寻着，最后，无数的目光向着记者的笔端停驻。周玉明显然看到了这种目光。

周玉明写得一手不错的散文和诗歌，有着很好的艺术素质和人生感悟，但她曾郑重宣布：“我要做一流记者，不做三流作家！”我佩服她的这种自我定位。前些年我给我的朋友吴芝麟兄的一本文集写序言时曾说，记者的眼光，在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都极其宝贵。真的，我不能设想，没有一大批出色的记者，中国将如何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

谨以这篇序言，表达我对一种代表社会良知的职业，一种现代文明结构的呼唤和礼赞。

她就是这块料

(序言二)

赵鑫珊

人走路会留下自己的脚印。人的精神发展也是这样。读者手中这本书,便是近年来周女士精神发展所留下来的一长串有深有浅的脚印。

大约是1953年的一天。在上海吴淞路底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二楼,一位约莫40岁的税务局职工周先生正在同一位来访的友人悄悄地交谈。交谈的内容涉及到当时经济领域里的一场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大头”(银元)和“老虎”(即偷税漏税者)是谈话中的两个基本词汇。

交谈的声音很轻,气氛有点神秘,也有点紧张。

周先生万万没有想到,他那个还在上幼儿园的爱女“登春”,此时此刻正躲在桌子底下一声不吭地偷听。最使小“登春”纳闷的是:为什么爸爸这位朋友是只“老虎”?

好几年过去了。“登春”渐渐长大,取学名为周玉明。

有一天,那只“老虎”来拜访周先生。等“老虎”走后,周玉明突然问爸爸:

“老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来我们家?他为什么叫“老虎”?

周玉明只好坦白交待当年她躲在桌子底下的窃听。

周先生再一次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爱女着实有点奇特。大家都知道的東西,她却有点傻乎乎;而大家不明白、记不住、把握

不了的东西,她一下子就领悟了,记住了。

是的,她善解人意。对人的眼神和声音,对人的陈述,尤其是对对方有关自身酸甜苦辣经历的吐露,周玉明不仅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还有一种天生的——从娘胎里继承下来的基因——同情心和正义感。

不用多加解释,造就一个杰出的采写报告文学的记者要有这样几个素质:激情、正义感、敏锐观察力、记忆力和写作速度。

周玉明几乎是样样具备。她好像不是学来的,她天生就是一块做记者的料。她是为采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同他(她)们一块哭,一块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古人说过: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此话不假。其实,四岁的时候,周玉明躲在桌子底下偷听父亲同友人的谈话这件事本身便是她的第一次无意识的新闻采访。

据说19世纪意大利伟大音乐家帕格尼尼在六岁的时候听到那深沉、浑厚的晚祷钟声会情不自禁地激动地哭。爱因斯坦在四、五岁的时候对指南针的物理行为特别好奇、惊讶。我国南宋杰出的哲学家陆九渊在四岁的时候就向父亲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天地何所穷际?”当时他的父亲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回答。不料,这个正在牙牙学语的陆九渊从此陷入废寝忘食的哲学沉思。

一个人往往在童年时期特别为之倾心和激动的事物,日后极有可能成为他一生为之献身的领域,并作出与众不同的贡献。

激情是一个人最可贵的素质

激情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动力和起点。

没有激情,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会产生出来的。

对现实生活的人和事,怀有一腔纯粹的激情,是周玉明采写和创作生涯的最大特点。

其实,你对什么怀有巨大激情,你的本质就是什么。

不过,周玉明的激情全然来自正义感。在她身上有一种豪气,一副侠骨心肠。在性质上,这仍然是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民族传统。

1993年春,她对范大雷教授的一系列采写,又一次“不平则鸣”,“拔刀相助”。

我多次陪她去探望过卧床在中山医院的范大雷(因为范大雷和孔祥东也是我的朋友)。永远出现在采访现场是周玉明的第一原则。从她18岁跨进文汇报的门槛起,她就恪守这条原则。她一直保有着满腔的正义感、真情和激情。这是难能可贵的,从而博得了文化艺术界普遍的称赞。她常常自嘲说:“我知道激情是我的不治之症,但我讨厌不死不活地生存着;与其让生命长时间冒烟,还不如让生命短时间熊熊燃烧。”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盟军一些杰出战地记者。为了拍摄到珍贵的镜头,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同冲锋枪手和坦克一起攻入纵深阵地。在我眼里,周玉明就很像当年苏联红军的“战地记者”,尤其是当她身穿草绿色短风衣的时候,显得颇有几分西方女军官的英气、豪气、神气。

好几年前,我曾看过一部纪录片,说的是西方有位电视新闻记者,为了抢拍意大利火山爆发的现场镜头,他的摄像机总是对着奔腾、咆哮、正在丝丝冒烟的岩浆流。那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英勇令人敬佩。

这就是我所说的新闻记者的激情。

没有这种激情,我劝你改行,干脆同文学艺术一刀两断,趁早“下海”经商去。

周玉明是个极度敏感的人。按气功师的说法,她全身的穴位总是打开的。于是天地人间好的气和坏的气,她都能极容易地不分清浊一一加以接纳。有好几次,她从中山医院看望重病中内脏出血的

范大雷出来，便口吐鲜血。对这种生物器官磁场的互感现象频频发生在她身上，我并不少见，所以也不足为怪。因为早在1985年，她去肿瘤医院探望闰惠芬的时候，一走出大门口，她也是一路呕吐回家的。关心她的气功师都警告她：“你这人不要去医院看病人，不要接触重病人，不要去火葬场，否则病气会到你身上！”但是周玉明从不顾及自己的健康，她有时真像一部“救火车”，哪里告急，她就冲向哪里。因为现场采写是她的永不违反的最高原则。范大雷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一边哭一边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写出了通讯《生死全在音乐中》。

报告文学《无言的辉煌》在文汇报上一发表，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字字句句均出自正义、真情和激情，才引出了千万个正义、真情和激情的共鸣。

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这是文学艺术的第一法则。

周玉明身上特有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息深深感染着被采访对象。她总想通过作品传递出在历史岁月覆盖下的坚毅和内在的生命律动，尽量多给读者一些文字以外的思索空间。今日世界，时代在变革，人情味、人性的复归，美好真诚的情愫，愈来愈稀罕。而周玉明一直坚持呼唤人心，呼唤人情，呼唤人性。她淡薄功利，看重感情。她坦言道：“我这个人注重储蓄金钱，但我注重储蓄真情、友情。”凡是被她采写过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她永久性的朋友，她的命运与她笔下人物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正因为这样，被她采写过的人物几乎都有续篇。在报告文学史上，这种血肉关系是不多见的。

周玉明出奇制胜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却是独特的辉煌：站在记者和作家的交界处、汇合处。

她将记者的新闻视点、迅速反应能力和写作速度同作家的揭示人的命运的形象思考集于一身，糅合在一起。光有记者，没有作家，等于没有大方向，没有深度，没有力度；光有作家，没有记者，等

于没有事实,没有现实性,没有时代脉搏感,没有写作速度。

关于周玉明的采访技巧和写作

在这个世界上,你得承认,的确有个性的魅力。不是所有人愿对所有的记者开口、披肝沥胆的。但在周玉明面前,一向缄默、内向的人,也会倾心吐露心中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隐私。

周玉明的采访特色是让人不感到自己是在被采访,她似乎没有固定的采访程式或过程。她在与采访对象自由自在的聊天中,在无拘无束的扯家常中,便捕捉到了许多重要细节和闪光的东西。等她的文章发表后,采访对象往往会惊讶:“你怎么这么了解我?”靳羽西的丈夫看了她写的《羽西的世界》后问靳羽西:“这个人怎么比我更了解你?简直像写情书。”靳羽西只好把周玉明叫到他丈夫面前:“你看看这个写情书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作曲家谷建芬的北京报界朋友看了周玉明写的报告文学《心曲》后,颇为不满地责怪谷建芬:“我们与你这么熟悉,可你对周玉明透露的材料都没有对我们说过,你给她的事实是那样生动,你偏心?”谷建芬委屈地解释道:“周玉明根本就没有一本正经地采访过我,她只是常来看望我,陪我去看病。我的新曲子写出来了,她叫我边弹边唱给她听。我的歌曲被歪曲批判了,她写信来安慰我,并叫我写文章在文汇报上发,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周玉明特别注重发掘细节。不管是她的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随笔,拥有细节的魅力正是她的作品生命力和感染力之所在。

她的采访是全方位的。她不仅倾听主角的叙述,也从许多配角(其他侧面)来了解主角的一切。当然,她更凭着自己的灵气和直觉判断一切。

我一向自以为写作速度很快,一天能写两、三千字。但同周玉明相比,我是甘拜下风。她常常一个通宵写一万字。《无言的辉

煌》便是她一个晚上写出来的！《送你一颗勿忘草》也是她连续一天一夜赶出来的。

这个速度真叫我不敢相信，但却是事实。不过，她的采访和酝酿的时间却是很久久的。一旦感到非写不可了，她便一气呵成。待她交了稿，她就会唱歌和猛吃猛睡猛喘气。她是一个干什么都极其投入的人。

周玉明的写作速度是她早年当记者练就的一手绝招。她常常边看文艺演出边写稿，有时她会中途去有灯光的厕所里写作。等演出结束，她的稿子也写好了。

我怀疑，在她的头脑里是否装有一台微型电脑？

对文章的开头，她是很费番心血的。她总是想好五六个开头，最后选择一个“凤头”。

听说有的大学新闻系教授经常用周玉明写的专访和报告文学作为教材或例子来加以分析。不少新闻系学生来信、来电求教她的采访经验，关注她的采访实践。

* * * *

报告文学仅仅是她拥有的一个高产“油田”。其实她还拥有好几个尚未正式开采的大“油田”。我指的是小说、诗歌和散文、随笔。我衷心希望能看到她许多优质的“原油”从新井中喷涌出来。

目 录

都市的良知(序言一)	余秋雨(1)
她就是这块料(序言二)	赵鑫珊(8)
无言的辉煌	(1)
——写给九泉之下的范大雷教授	
无法回报的爱	(12)
给范大雷母亲的一封信	(29)
朱践耳的命运交响曲	(37)
闵惠芬的“梦幻曲”	(48)
行路难	(67)
——著名评弹演员徐丽仙的艺术生涯	
人生不能没有恋	(84)
——已故弹词名家徐丽仙的爱情故事	
《花轿泪》与周勤丽的泪	(94)
送你一棵勿忘草	(103)
——朱明瑛赴美前的自述	
自信是我的上帝	(134)
——朱明瑛赴美留学四年自述	
她拥有自己的世界	(157)
——芭蕾明星辛丽丽纪实	
一个最易被误解的女人	(167)
——周洁写真	